

我的第一个作品

二十二位著名作家撰写



浙江人民出版社

我的第一个作品

王西彦 王 蒙 叶文玲 冯德英 任大星
西 戎 许 杰 刘绍棠 何 为 严 阵
李存葆 陈学昭 林斤澜 孟伟哉 俞天白
茹志鹃 秦 牧 唐 弢 浩 然 蒋子龙
雁 翼 黎汝清 (按姓氏笔画)



封面设计 陆振伟

责任编辑 朱发耕

我的第一个作品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0,000 印数00,001—15,5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379 定 价： 0.77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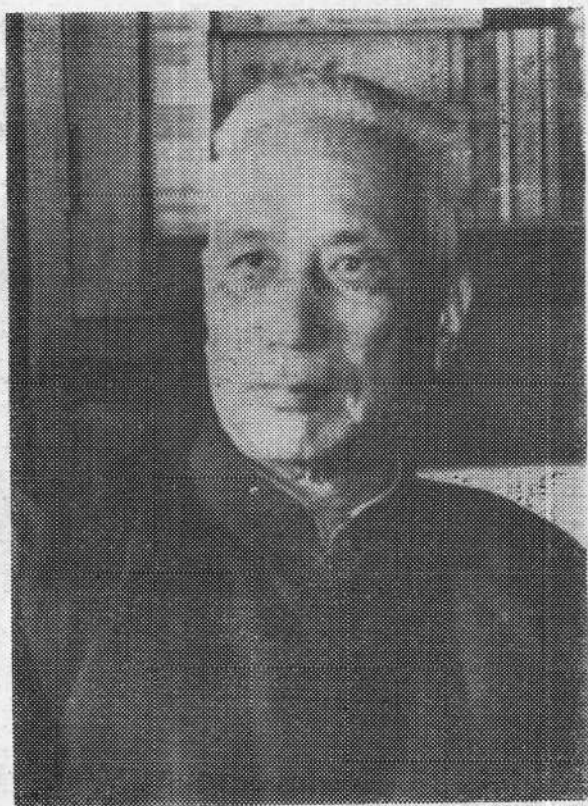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22位在当代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所撰写。他们叙述自己处女作发表的曲折经历，描写自己成长的经过，道出了自己在探索中的艰辛、失败时的苦恼和成功后的喜悦。从而启迪人们：文学的殿堂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她向每个人都敞开着大门，只要你不惜拼搏，百折不挠，认准目标，持之以恒，就一定能登上这圣洁的殿堂。

本书文章都是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的，因此，言之有物，感情真挚，对广大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那些在文学创作上跃跃欲试的青年们更具有借鉴意义。

王西彦	我的第一篇小说	(3)
王 蒙	我的第一篇小说	(9)
叶文玲	摇出一叶荷露	(17)
冯德英	故土——我创作的源泉	(35)
任大星	初学作者者的脚步	(45)
西 戎	我迈出的第一步	(55)
许 杰	我的第一篇小说	(67)
刘绍棠	我的第一篇小说	(75)
何 为	我从这里起步	
	——关于我的第一个作品《路》	(83)
严 阵	落尽春红始着花	
	——我的第一个作品发表前后	(91)
李存葆	一个爬行者的回顾	(107)
陈学昭	关于《倦旅》的写作	(123)
林斤澜	知难	(129)
孟伟哉	永不隐瞒自己曾是怎样的笨拙	
	——《命令》的写作与发表	(137)
俞天白	在挫折中寻找自信	(145)
茹志鹃	《百合花》与浙江	(153)

秦 牧	我的第一本书	(159)
唐 弢	我的第一篇文章	(165)
浩 然	成功的秘诀是持之以恒的 刻苦努力	(171)
蒋子龙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185)
雁 翼	学诗初记	(195)
黎汝清	我有七次“第一个……”	(203)



王西彦，男，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青塘下村。一九三三年进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随后参加“左联”和“一二·九”运动，曾任当时由“左联”扩大而成的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参加《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的编辑、教学工作。一九三九年到福建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相继任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五三年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一九五五年起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报复》、《乡井》、《乡下朋友》等十多种，已分别编入《王西彦初期作品选》和《王西彦小说选》；中篇小说《风雪》、《还乡》等，已编入《王西彦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古屋》、《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神的失落》、《寻梦者》、《在漫长的路上》、《春回地暖》等；散文集《王西彦散文选》、《炼狱中的圣火》、《忧伤的世界》、《晚望》等；理论文集《第一块基石》、《书和生活》等。除理论外的部分作品，已编入五卷本《王西彦选集》。

我的第一篇小说

王西彦

在作家中间，有的人才气磅礴，出手不凡，第一篇作品就一鸣惊人，轰动文坛；有的人却悄悄地写着作品，悄悄地追随着文学队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独自走着一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才能坚持的寂寞的路子。

我觉得，自己的情形就属于后者。

我的老家是浙江义乌东乡的青塘下村。在铁路通到以前，我们那里是个偏僻的山区。村民特别是妇女们，连进一次十里路外的县城也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如果有谁上过省城杭州，他在村子里就成为显赫的闻人。我从县城的初中毕业后，幸运地考进了省城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最初上学时要赶两天山路，到诸暨县城搭小火轮，经过一宵水路，才能在杭州的江干码头上岸。可是，等到我从省城的学校毕业时，铁路竟已通到我们那个山区了。记得有年寒假回家，村子里人们奔走相告，说是沿着村后里把路远的石板官路边插来了小旗子，一些头戴官帽的人正背着架子在那里测量土地，凡是路边的田地都要挖开填平，为的是要通“火龙”。

这个消息令人好生奇怪：“火龙？什么火龙？”自然有见多识广的人给大家解释：“刘伯温的签书里有言在先，叫做遍地蛇龙走马，不就应在现在的火龙上？”天意难违，人们自然只有眨眼咋舌的分儿。果然，又有消息传来了，说是县城北门外已经开到一队说话卷舌头的北佬儿，都带起大铁锹，挖土掘地时发现肥大的地蚕就抢着往嘴巴里塞。到第二年暑假，不但走“火龙”的铁路已经开出来了，离县城北门口三里路的地方也已经建筑起红砖的洋式平房，叫做“车站”，好让跑累了“火龙”站住喘口气。再到下次假期时，那比水牯还要大得多而且会喷吐火焰的钢铁巨怪，果然所向无敌地闹到我们这个原是贫瘠却很平静的山丛里来了。

不用说，这个怪物的出现，吸引了远近成百上千人的兴趣，大家都怀着揉合恐惧和好奇的心情，象赶草台戏一样地赶往车站观光。最初，他们既无法理解眼前这个怪物的行动，也不能预料它将给大家带有福祉或灾祸。但不久，他们终于逐渐熟悉它了，开始和它打起了交道。因为有旅客上下，有的人就在附近摆起小摊头；因为有货物运送，有的人就肩着扁担或推着板车来赚“外快”；因为乘搭夜车的人进城不方便，更有人在通往县城的路边盖起房子，开起饭店和客栈。再不久，我就听到一些关于火车和车站的离奇新闻，例如，有的生意人跳车自杀了，也有的媳妇和姑娘跟火车上的办事员跑得无影无踪了。诸如此类。终于，我又听到因为来往客商的增多，客栈买卖的日趋兴隆，有些心机乖巧的人竟然在附近一带农村年青妇女身上打主意，为她们开辟起一条悄悄进行的“生财之道”。……

由于我的母亲和三个姐姐都是童养媳，我家周围的堂房

婶婶嫂嫂们也几乎都是贫苦农民的妻子和儿媳，她们中间有的甚至被出典给别村的男人，童、少年时期更经常听惯和我年龄相若的同村姐妹们在被人贩子带往外码头出卖时的啼哭声，我对家乡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有着很深的印象，所以关于车站附近的客栈能给农村妇女开辟“生财之道”的新闻，在我是丝毫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当时我刚提笔开始学习写作，童、少年时代身经目睹的家乡农村生活的回忆正成为自己所采用题材的源泉。因此，一个强烈的冲动来到我的意识里——应该把试笔的第一篇习作，用来描写家乡农村妇女的悲剧遭遇。

这就是写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那个短篇小说，它的题目叫做《车站旁边的人家》。

当年暑假，我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毕业了。我是一个官费生，三年学杂费用都由本县负担，按规定要回义乌去当新成立的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不然不仅要缴回费用，还要受到惩处。可是凭着一股向往广大世界的热情，我带着因毕业班提前结束课程而剩余的膳费，还不够买一张杭州去北平的三等火车票，就不顾一切地先跑到上海，随后就买了一张英商太古轮的统舱票，挤在纷纷扰扰的甲板上，登上北去的“征途”。随身携带的，除了简单行李，就是那几页小说的初稿。

我经由大沽口到达那北方古城，住进和平门外一条小胡同的一所破旧屋子里，它是浙江会馆拨给浙江籍穷学生免费居住的。我就在那所屋子后进的一个丈把见方的小房间里，重温起那个想从事写作的美梦。于是在北国寒冷的冬夜里，我把《车站旁边的人家》认真修改了一遍。小说描写一个已

经有着好几个孩子的母亲，被饥寒所迫，在大雪纷飞的晚上，踏着泥泞的村路，上车站附近的一家客栈里去做“生意”。一面修改，一面脑子里浮现出我所熟悉的那些婶婶嫂嫂们满脸愁苦的表情，我感到仿佛自己也已经置身在冰雪弥漫的田野里，全心灵都起着剧烈的颤栗。

第二天，我把稿子装进信封，投寄给天津一家大报的文艺副刊，去试一试难测的命运。大概是第五六天吧，总之不满一周，编者的回信就来到了，他很给我写了一些鼓励的话。随后，小说也很快就被刊登出来了。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命运原来并非难测，尝试竟然能换取成功。但作品毕竟写得不够深刻，文字尤其拙劣幼稚，虽然发表了，但也就默默地过去了。只是对我自己来说，它毕竟是第一次的尝试，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起点。因此，几年后编选第一个小说集时，我把它放在第一篇的地位，事实上，它也的确是第一篇。

岁月匆匆，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不久以前，借着整理旧作的机会，我又把这篇青年时代的作品修改了一遍，使我吃惊的是，原来在同一时期里，我还写过两篇题材大致类似的习作。好在每篇的字数都不多，我就索性把三个短篇联缀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把第一篇的小标题改为《飞雪的日子》，又把《车站旁边的人家》移作总题目，编进了即将出版问世的《王西彦小说选》（第二集）里，同样放在第一篇的地位，也顾不得读者可能指责我对自己最初的习作过于偏爱了。



王蒙，男，1934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北平团市委工作，同年8月入中央团校学习政治理论。1953年，《北京日报》、《文艺报》选载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79年出版）。1955年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次年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3年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1976年10月后，相继发表短篇小说《最宝贵的》（获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夜的眼》、《说客盈门》、《风筝飘带》及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等。1979年调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冬雨》、《王蒙短篇小说集》，同年加入中国笔会中心。现任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

我的第一篇小说

王 蒙

我的第一部小说是长篇《青春万岁》。小时候，大约十岁左右吧，我曾在一个笔记本上练习写“小说”，我至今记得那内容是描写一个清道夫（现在没有这个名词了，现称清洁工）的一天，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个“清道夫”的自白，说他一天所得勉强“糊口而已”，不知道童年的我为什么要写一个“清道夫”的文章。当然，那是不能算数的。

一九五三年我十九岁，已是青年团的干部，当时还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感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的大好形势，我曾申请去考大学，我想学土木建筑。这说不定与我看了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第一个职务》有关，工地、脚手架、卷扬机与搅拌机是那样地吸引了我。

考大学的申请未获批准。眼看着我们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

恋革命运动的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的转变当中生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现的了，我想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为什么不写一部长篇小说呢？

这个想法本身就使我激动，使我恐惧，使我羞怯，又使我做起了诱人而又折磨人的文学之梦。

我也知道应该先从短小一点的作品开始练笔。但是，带着少年人的狂妄劲儿，我希望我写的与众不同：生活气息、诗情、哲理……我企图打破那种以一个贯穿的戏剧性的故事来结构全篇的惯常的写法。我知道我的这种追求不一定成功，也不一定易于被接受。我觉得一个短篇份量太轻了，即使被否定了，是否就能证明自己的追求是不对的呢？难说。只有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感受通通倒出来，写到一部长篇里去，文学界的师长们才好判断我写的东西是否有一点价值。

这样我就给自己提供了一个艰难的、难以胜任的任务。最大的苦恼在于结构，而相反，种种情节片断、生活细节、情绪抒发、人物性格、生活场景，写起来似乎倒还自然而且丰富。可是怎么把这些片片断断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呢？仅仅在纸上画结构表就画了不知多少次，越画越觉得千头万绪，头昏脑胀，脑袋简直要爆炸。

能不能集中写一个故事呢？太抱歉了，我要写的不是一

个大故事而是生活，是生活中的许多小故事。我要反映的这一角生活本来就不是什么特殊事件，我如果硬要集中写一个故事，就只能挂一漏万，并人为地为某一个事件添油加醋、催肥拉长，从而影响作品的真实性、生活感，并无法不暴露出编造乃至某种套子的马脚。这样的事，我不想干。

这就苦了我，东写点，西写点，斑斑点点，几乎乱成了一团，我真想把自己打一顿，哭一场，为什么这样无能。

从开始写第一稿起，我对文学的热劲一下子就猛增了。解放初期，我忙于工作，立志要做的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并没有用多大力量去学文学。五三年以来，我狂热地读起古今中外的名著来了，越读越入迷，越读脑子越发热，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不行，又越读越觉得自己写的有希望。

“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作家？”我会不会失败而白白地浪费时间、精力，遭人耻笑？开始写第一篇作品的时候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念头。我的切身体会是，这种夹杂着个人得失的念头就象毒蛇一样，缠绕着你，引诱着你，只能扰乱你的写作，扰乱你对于文学创作的纯洁的与刻苦的追求，甚至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影响你与周围的同志的关系，乃至影响你的饮食、起居、神经的健康。过分的“文学狂”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使你象发疟子一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文学事业有文学事业的守恒法则和平衡定律，头脑过热，孜孜以求，越是这样越写不成，写不好。所以，从切身的经验出发，我主张给过于热狂的文学青年适当泼一点冷水，而真正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对那些确有才华又确无经验的青年作者，这种关怀和支持应该藏在心里，应该化为切实有效的具体帮助，千万别随便说那